

# 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sup>1</sup>

吳介民

台灣的民主政治正處在歷史變化的交會點上。2008年五月「二度政黨輪替」之後，馬政府展開新的大陸政策。海峽兩岸的政策互動以「國共平台」為媒介，迴避對等國家模式的協商，引發諸多疑慮。加之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期間，警察維安過當侵犯人權的爭議，使得兩岸的「國家和解」之途，一開始即蒙上陰影。「中國因素」正在沁染台灣日常政治的運作，並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前景的互動方式與節奏，格外需要謹慎對應。中國因素由外而內，貼近到台灣的現實生活。如果這個社會不願意認真看待這正在發生的情勢，不但會錯失形塑良性中國政策的契機，社會內部藍綠分歧可能加劇惡化；甚至，台灣作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民主國家地位，也將遭到動搖。

本文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首先將從理論與歷史的角度，討論「主權受挑戰之民主國家」的處境與難題；接著分析中國因素，如何以

---

1 本文是由一份圓桌會談引言稿發展而成的。「民主社會如何可能？解嚴20年來臺灣經驗的反省」圓桌會談，2008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2008年12月13日。作者感謝廖美、陶儀芬、吳乃德、郭宏治、汪宏倫、張貴閔、彭昉、曾熾芬等人的修改建議。

國共平台的機制影響台灣政治；最後，關於如何思考、實作兩岸政治社會互動，作者拋出幾個初步提議。

## 一、國家條件與民主政治

研究政治體制與民主轉型的學者林茲與史特班曾經指出，民主化過程中，存在一個所謂「國家條件」(“stateness”)的難題<sup>2</sup>。他們認為，主權國家是現代民主政體的前提。民主是現代國家的一種治理形式。國家這個強制性的組織，涵蓋了在它統治底下的所有公民。假如在一個國家，實施民主政治的領域範圍，與其領土統轄範圍沒有重合，則這個國家難以建立民主體制，即使建立也難以存續。因此，這兩位作者下了一個結論：「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sup>3</sup>

歷史上，有幾個案例支持這個論斷。英國殖民下的印度，倫敦政府保留對印度的統治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難以成爲一個民主政體，因爲香港民主化的程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限定；而威權的中國中央政府也不會允許它統治下的一個地方單位成立民主體制。香港問題是現在進行式。香港在英國統治下，尤其是殖民末期，享有高度的市民自由(特別是個體的自由權[individual civil rights])，但無民主體制、或僅有低程度的議會政治。香港統治權回歸中國之後，中國政府對於市民自由權的負面影響時有所聞。近年

---

2 Stateness不容易找到一對一的中文用語。在此處翻譯為「國家條件」，但在本文其他語境中有時則翻譯為「國家地位」。Linz an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Chapter 2.

3 Linz and Stepan (1996: 19).

來，在特首直選議題上，北京毫不放手，似乎證實了上述缺乏國家條件難題的論斷。我們可以將林茲與史特班的命題，稱為：「主權不完整國家民主化」的難題<sup>4</sup>。

## 二、「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的處境

林茲與史特班命題並不能直接套用於台灣，但對於我們思考台灣的國家定位、民主發展、以及兩岸交往正常化，能帶來一些啟發。台灣歷經二十年的民主轉型與二度政權輪替，民主政治已經初步鞏固。然而，社會內部對於國家認同的分歧、兩岸之間的主權爭執，北京對台的統合攻勢，是否使台灣陷入民主體制難以鞏固或維繫的困境？首先，讓我們觀察台灣／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社群的國家地位的議題。

根據韋伯(特別強調國家的「領域性」)和逖利(Charles Tilly)(強調統轄領域內擁有自主權)等人對現代國家的定義，台灣這個政治社群作為一個國家，殆無疑意。從幾個指標來看，台灣政府，都與現代國家的條件吻合：民選中央政府、司法體制、財政與稅收、軍隊組織、在其統治領域內壟斷合法武力等等。

再看國家統轄領域與實施民主之政治社群的重疊程度。中華民國實際統轄台澎金馬領土，而這些領土都實施同一套選舉民主制度。從以上兩個角度觀察，台灣確實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的主權獨立民主國家。

但是，有幾個因素，讓台灣的主權性質產生模糊，並影響其國

---

4 這個命題用英文表達是：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vereignty-incomplete country”。

家界線的明確性。第一，在當前國際政治體系中，台灣不被強權承認為主權國家。國際強權承認、默示、不挑戰、或認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主權的宣稱。第二，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國大陸為其法定領土的一部分。李登輝曾經在1998年宣稱台灣與中國乃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即是在巧妙地「劃清」台灣的國家實際統轄領土範圍。馬英九在2008年說，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而是「地區與地區關係」，則再度模糊了台灣的「國家界線」。第三，在「國族認同」議題上，台灣有部分人民，贊同台灣與中國統一、或不反對與其在政治上統合。就這部分人民而言，台灣的國家界線乃應統攝到中國的領土範圍。由於上述因素，台灣的國家定位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懸疑、未決狀態。

延伸前述林茲與史特班的理論觀點，台灣的國家定位的模糊性，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外部的、領土疆域的範圍，因為北京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而產生爭議。另一個是內部的、國族身分與民族主義的競爭。前一個問題是兩個國家(state)之間的領土宣稱與主權爭議。後一個問題則表現為國家內部(intra-state)族群政治與國族認同的爭議。因此，當我們說，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sup>5</sup>，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這兩個問題，對台灣而言，本來可以分別處理。假如不存在外部的主權受挑戰，內部的認同爭議，隨著社會民主化、族群和解、以及新生世代的成長，將逐步導向「生活在台灣」的現實共感。因

---

5 這個概念用英文表達是：“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

此，國族認同分歧並不必然會導致論者引以為憂的「民主內戰」狀態。但是，由於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地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族認同兩者糾結不清。2000年以來，台灣民主發展的種種危機，即反映了「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難題。要克服這個難題，必須先準確評估中國因素的演變。

### 三、中國：灼熱的存在

1949年以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演變，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冷戰時代兩岸全然阻隔。中國這個意象，被專制統治的國民黨以「中華道統」的論述壟斷。在此階段，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地區，是抽象而遙遠的存在。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保護下生存，並宣稱代表整個中國。國民黨的教化機器灌輸人民這樣的大陸情狀：飽受貧困、鬥爭、封閉所蹂躪的「神州」。同時透過反共意識形態塑造對岸為「共匪」形象，藉此增強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合理化」白色恐怖政治。對於老一輩抗拒國民黨統治的左翼人士而言，國民黨乃是右派法西斯政權；對於信仰本土價值的人士而言，國民黨則是具現了中國政權的專制統治。然而，吊詭的是，如今國共已經再度合作，冷戰時代國民黨的右翼政治與反共教條，卻在台灣社會留下相當普遍的、保守的階級心態。這樣的「恐共心態」延續至今。

第二階段，後冷戰初期(1970年代初期-1990年代中期)，以中美和解為初始點，緩和了東亞地區的戰爭威脅。國民黨與中共之間激烈的「中國代表權」之爭塵埃落定，北京被國際強權承認為中國的合法代表。面臨國際地位危機的國民黨，陣營內部出現了「革新保台論」。兩岸之間的主權爭執，隨著美國對台外交承認的撤除而浮

現於台灣政治舞台。1980年代，在蔣經國統治的末期，台灣與中國大陸恢復交往。1987年，蔣經國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其實，少數台商在開放探親之前就已透過第三地到大陸投資。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台灣資本紛紛西進中國，牽引大規模的工作移民。這個階段，也是台灣民主化的啓動階段，抽象的中華道統，淡出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光譜，現實感逐漸回歸日常政治場域<sup>6</sup>。這個階段，脫離毛主義統治的中國，展現出「全民皆商」的景觀。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通過西進資本的操作，「大陸熱」在1990年代早期經常登上台灣報紙頭版。中國因素具體浮懸於海峽上空。

第三階段，中國崛起(1996-)：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隨著經濟實力展現出來。1997-98年，中國渡過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事件」之後，美國在反恐戰略上需要中國配合。中國龐大的外匯存底，使其擁有國際金融操作的槓桿。其潛在的國內消費能力，吸引世界資本的目光。2002年，中共十六大順利完成接班，顯示這個後極權主義體制的韌性。這個階段，幾十萬台商與台灣外派人員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台資群聚地區，形成社會經濟網絡。

總的來說，中國崛起，應該放在後冷戰國際政治體系強權結構變化的趨勢中分析。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中國飛彈軍演威脅，是個轉捩點。這是北京政府在後冷戰階段，第一次挑戰美國在東亞的獨霸地位。對台灣而言，1996年的總統選舉是否能夠平安順利舉辦，攸關民主政治以及更重要的「主權在民」原則的確立。由於美國強勢軍力的介入，解除了海峽戰爭危機，然而，正因為這次危機，台

---

6 蕭阿勤將1970年代的台灣菁英，稱為「回歸現實」的世代。參見《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

灣社會第一次切身地感知到中國具威脅性的、巨大的存在。此後，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的容貌開始具體化、實體化，進而感染到台灣內部的政治論述與政治競爭。也是在這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之後，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雙重難題交疊呈現：北京對台灣的領土主權宣稱，以及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與一個日益「炙熱」的中國因素，交熔在一起。從短期效果來看，1996年的總統選舉，使台灣確立了主權在民的實質獨立國家地位。正因為如此，北京才會擺出不惜一戰的威脅姿態，試圖阻擾台灣的民主進程。就長期效應而言，從這一年海峽危機開始，中國因素具體影響了台灣的政治生活。

「國家認同」的困擾，從此變成我們必須面對的政治問題：國家認同不僅是「內生」的問題，同時也是「外鑠」的難題。困擾我們多年的「藍綠爭議」，其實是「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一個副作用，這個集體焦慮所導致的社會能量虛耗，固然有族群權力競爭、國族認同分歧、政客煽風點火的因素，但其本質是地緣政治的、結構制度的動能。汪宏倫從制度論的觀點，曾經精確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意符(signifier)，其意指(signified)已經被對岸所先佔(preempted)，而『台灣』作為一個新的集體指稱的意符，既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持，在國際上也受到種種阻撓，使得台灣政府與人民，僅僅是為了『如何指稱自己』這件事，就得受盡各種挫折，浪費無數精力。」<sup>7</sup>

「中國」，由遙遠、抽象、朦朧的，高掛在海峽遠方的存在，日益貼近台灣生活的現實，炙熱地貼靠我們身旁。

---

7 汪宏倫，〈國族問題中的制度因素、全球脈絡與怨恨心態〉，收錄於王宏仁等人編輯，《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

#### 四、國共平台侵蝕台灣民主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試圖改善兩岸政治關係。這本來可以是兩岸政治敵對和緩的契機，也可能是兩岸社會良性互動的轉捩點。但是，馬政府的處理方式，不但濫用了兩岸和解的氣氛，破壞朝野間原已十分薄弱的信任，更引發了民主倒退的憂慮。

首先，馬政府推動兩岸協商，是透過「國共平台」進行。國共平台始自民進黨執政時期；當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國共平台從「民間政黨交流」的性質，蛻變為準官方的色彩。這個平台迴避正常的國家交往管道。本質上，它是黨對黨交流，卻獲得國民黨政府的追認與執行。在台灣，這個平台的協商迴避了立法院的監督，以及公民社會的參與。其進行方式如同祕密外交談判，其操作違反民主國家責任政治的原則。

第二，國民黨從「反共」到「親共」之間的跳躍，有著令人驚訝的歷史斷裂<sup>8</sup>。台灣已經是一個藍綠分歧的社會，推動與北京協商，應該先在台灣社會內部尋求共識與互信。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反其道而行<sup>9</sup>。結果，馬政府的作為使得「主權爭議」益形惡化，被指責為「出賣台灣」，於是又匆忙宣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絕不會賣台」。然而，就在重申台灣主權不久之前，馬英九在回答外國記者詢問時說：台灣與中國大陸是「地區與地區」的關係。這等於承認了北京所要求的「一個中

8 見陳芳明，〈從反共到親共之間的斷層〉，《聯合報》，2008/11/27。

9 徐斯儉最早對於國共平台的協商模式提出批判，〈藍綠溝通比國共溝通還難？〉，《中國時報》，2008/10/31。



國」原則，也間接承認了台灣不是主權國家。這種前後反覆矛盾的主權說詞，正反映了「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的困境。馬英九作為這個國家的直接民選總統，不但深陷於這個泥淖，自己的言論與施政更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第三，2008年10月，陳雲林來訪期間，馬政府出動天羅地網般的警察維安人員，將台北街頭清理得「彷彿戒嚴」景觀，侵犯人民言論集會自由。這使人擔心，以這樣的「治安規格」招待來自北京的特使，是否也是中共要求的戲碼？這種「消音式維安」，是否以後只要中方談判官員來訪，馬政府就配合演出？

兩岸國家和解理應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社會、更好的政治生活。和解的真諦是原本抱持敵意的雙方以對等、相互尊重、開放的方式展開交流與協商。但是，國共兩黨合作演出的是，私密化、黨天下的協商。海協、海基兩會的簽約儀式，只是臺面上的表演。兩岸黨政官員談判與互訪過程，不應該犧牲民主價值(包括程序的與實質的)，以順應中方所習慣的非民主治理模式，以國家機器壓制人民聲音，來迎合中方官員長期處於威權環境中習慣的「舒適感」。

圍繞著國共平台所引發的疑慮，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組正在發生的關聯現象，可能如「白蟻效應」般侵蝕台灣社會的民主根基：

- (1)北京以其雄厚的經濟規模與財政能力，將台灣視為一個特殊的境外地區，通過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貿易、投資、市場分享)而形成一個對於台灣內政的「影響力槓桿」(influence leverage, 依賴理論的經典議題)。
- (2)被國共所壟斷的海峽談判，排除反對黨與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是否會逐漸危害台灣民主鞏固的進程？
- (3)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在台灣國家機構中形成強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

(4)北京政府藉著這些準制度化(但不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機制，形成對台灣內部事務決策的影響力(例如否決權、政策發動權力、政策干擾權力等)。

國共平台侵蝕台灣民主根基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在短期內感受到。但是，等到中共對台灣內政的影響力槓桿確立之後，則難以收拾。國共平台作為統治菁英與紅頂巨賈的金權饗宴，其所設定的議題，掩蓋、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而且缺乏正當民主程序。背後的利益集團，是寡頭壟斷資本(台方)與國家官僚資本(中方)的跨海峽聯盟。對壟斷性財團而言，國共平台很有效率，直航等財團利益在密室中分配，比攤在陽光下協商省事。哪些紅頂商人有資格參與冠蓋雲集的「國共論壇」？哪些特殊利益可以通過協商而分配？具體回答這些問題，就可以了解這種政治協商模式的本質。

目前仍在發酵的全球資本主義矛盾、金融危機，可能迫使各國採取自我保護措施，並使得各國強化經濟管制、抓緊對社會的控制與干預，而在全球層次產生民主限縮、或甚至「法西斯化」現象；另一種更駭人的可能性，則是國際強權通過戰爭來解決爭端。假如前者成真，會使得「兩岸交往國共平台化」的趨勢，得到台灣人民更大程度的默許：許多人會寄望中國國內市場對台灣資本開放，能夠給台灣經濟帶來好處，而「適度」犧牲責任政治與人權法治是可以容忍的——儘管與中國更進一步的經濟整合，可以給台灣社會帶來哪些正負面的經濟效果、以及社會成本由誰分攤等議題，到目前都還沒有充分討論。假如後者成真，則台灣可能不自主地捲入霸權戰爭之中，在極度不確定性或恐慌之中，被迫選邊站，而成為強權的砲灰。

然而，中國因素，對台灣社會內部的作用，並不必然是負面的，也不必然導致社會內部的持續分化。辯證轉化的可能性之一，在於

台灣的公民社會，如何精準理解中國歷經30年的市場轉型發展之後，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的變化。如何通過正常化的兩岸交流，不讓「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進程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更進一步，讓兩岸社會健康而正常化交流，促進雙方對彼此政治歷史感的理解。這樣的互動模式，就比較可能將兩岸交流轉化為台灣內部民主化、族群和解、藍綠和解的資源。以下嘗試從這個方向提出可能的出路。

## 五、「兩岸國家和解方案」公民運動

台灣民主的生存發展，遭遇了國家定位的難題。而解開問題糾結的一個路徑，在於如何通過民主開放而穩當的方式，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首先，是社會集體心態的調整。背對中國，無視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微妙變化，對台灣沒有好處。「背對中國」的社會集體心態，在台灣呈現兩種極端狀態：一種是無批判性的擁抱中國，將中國經濟當作無窮的機會與利益，不在乎中共威權政治的壓迫性(第一種中國想像)。其對立面則是無差別性地批判中國，將中國化約為充斥威脅與風險的社會，無視其廣大民眾追求良好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意向(第二種中國想像)。兩種態度都是逃避，無從掌握中國的現實。這兩種中國想像差異極大，卻有共通之處，就是缺乏社會觀點。台灣需要具有現實感、基於進步價值的中國論述，也需要細緻的社會分析。這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面對中國」：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再是個極權主義

政權，而是具有韌性與彈性治理能力的威權主義政權<sup>10</sup>。

經過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共產國家」，而更接近官僚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更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科技化與細密化，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儘管社會仍受國家嚴格管控，但就像到處都存在的灰色經濟空間一樣，無數NGO活躍於國家監控末梢的灰色社會空間。抗爭者所從事的，不再是毛主義式的「階級鬥爭」，而是以各種巧妙的論述包裝其權利主張，例如把上街遊行叫做「散步」、包圍官署叫做「上訪」，就像20多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叫做「自力救濟」。總之，中國各種社會主體正在湧現。

國民黨將近半個世紀的反共、恐共教育，是台灣「鎖國心態」的歷史根源。這種教育妨礙台灣人民健康而自信地看待中國社會。但歷史的反諷是，灌輸反共教條的國民黨，如今跟共產黨把酒言歡，台灣民間卻還在背負著「紅色中國」宣傳的債務。

北京對台灣的威脅(軍事的、政治的)是真實的存在，但是「紅色恐怖」失之誇大。確實，對中共政權生存或其統治正當性有威脅的主張與活動，例如最近由自由派異議人士發動的「零八憲章」，馬上遭到鎮壓。但是，對不具立即政治威脅性的集體行動，北京當局則經常默許、或放任人民「依法抗爭」，來增強其威權治理的「效率」。總之，台灣經驗倘若對分析中國發展有所啟發，則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之後，「社會力」的發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第二，民主的公共生活需要一個具有「生活化共通感受」的政

---

10 參見Nathan, Andrew,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17. 黎安友(何大明譯), 2007, 《中國政治變遷之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台北：巨流出版)。

治共同體為前提。不同的認同主體之間，互相傾聽、感受對方的歷史感，進而存異求同，獲致共同政治生活的基礎。例如，近年來一些NGO與學者提倡社會內部的溝通實踐，講自身族群身世的流離悲情，以族群對話來化解認同分歧。這些當然是必要的社會實踐。然而，藍綠國族認同紛爭，固然因為政黨競爭、兩個「民間社會」對立等因素而激化，但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台灣的國家地位受制於國際強權政治格局，使得「國家定位爭議」，在民主化的過程催化激盪<sup>11</sup>。

因此，「超克」藍綠分歧的前提是，真實面對結構困局，而不是提倡唯心的和解論。因為，抽離現實條件的超克論，不會為多年來不斷「內捲化」、自我再生產的兩個民間社會內部各自的集體焦慮與「妒恨心態」，帶來任何舒緩效果。藍綠各方應該在「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這個前提下進行公共對話，尋求政治生活的共通點。換言之，差異國族認同之間的互相肯認，需要以對於台灣外部結構處境的共識為前提；以此為基礎，擴大政治社群(共同體)的認同範圍。

統獨未來的選擇，不是不能談，而是如何談，基於何種社會共識來談？台灣十幾年來關於國家定位的民調，「維持現狀」大致超過半數。這個「維持現狀」的意見，涵蓋了很大部分的「中間選民」以及「淺藍」、「淺綠」的支持者。本文提出的台灣國家狀態，可能相當接近「維持現狀」的陳述，但是過去缺乏以分析性的語言將

---

11 「民間社會」不同於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構成要素是公共領域。而民間社會是由私人利益、「常識」、情感認同、族群語言、文化慣行等日常經驗所構成的常民世界。兩個民間社會在此是指「藍」、「綠」二者。參見吳介民、李丁讚，2008，〈生活在台灣：選舉民主及其不足〉，《思想》，第9期(2008年5月)，頁33-68。

其內涵講清楚。維持現狀是指：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已經實施了十多年自由開放的選舉制度，並且由全民直選產生國家元首。就此而論，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乃是完整而自主的。然而，問題在於外部環境。台灣在國際外交活動上受到限制，是因為「一中原則」對台灣的壓迫性。在國際強權結構的現狀沒有突破性的變化之前，北京與台北之間存在著「主權爭議」，乃是台灣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因此，與北京展開任何正常化交往，必然會觸及這個「不舒服的事實」。要言之，處理外部困境的必要性，並不亞於內部困境的疏通；外部困境的緩和，有助於改善內部的爭擾。

在適當的條件下，兩岸的國家和解，有助於台灣內部分歧國族認同的和解。其中，一個必要條件是民主程序的正當性。兩岸政治交往不應該由兩個代表政商利益的政黨壟斷。任何涉及台灣民主國家地位的兩岸協商事項，必須事先取得民主治理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筆者提議兩個層次的公共對話：

- (1)在台灣內部，應該開展「兩岸國家和解方案」的公民對話，以公民社會為主體，邀請各主要政黨與公民團體代表，召開一系列的公民會議，溝通辯論兩岸政治經濟交往的原則。在民主國家，國會(立法院)本應承擔起大部分的職責。但是在國族認同紛擾，以及國民黨全面掌控行政立法資源的局面下，立法院似乎已經失去履行此項職能的能力。因此，公民社會更須承擔起此一責任。這個公民對話不是短期的會議形式，而應視為長期而持續性的公民社會運動。
- (2)另一個層次的公民運動，是跨海峽的公民社會對話。台灣的公民團體，應該積極與中國社會各界展開交流，而不是自動放棄，將兩岸發展方向與交往內容，任由國共兩黨操作。兩岸交流，也絕不應該由代表兩方財團與官僚利益的資本聯盟

所壟斷。以公共領域的形式，尋求與中國社會的自由派進步力量連結，形構一個「兩岸公民社會平台」，讓兩岸社會開啓互相理解。

兩岸公民社會平台，不但迥異於政黨私利導向的國共平台，並且是促成兩岸社會正常交往的催化機制。首先是「地緣政治的考量」。台灣處在亞太地緣政治環境中，經不起「背對中國」而自我傷害。同樣的，中國的持續發展，也需要一個和平共榮的海峽關係。在決定與彼岸進行任何方式的政治協商之前(或反之，力求維持目前的政治地位)，台灣社會有必要同情地理解中國社會的現狀與處境，同時也要求中國社會以對等態度理解台灣歷史。其次，台灣人民不論對中國社會是否懷抱「同文同種的情感認同」，都需要理解：兩個社會之間並無任何理由抱持敵意。兩岸敵對，倘如國共兩黨所宣傳的，是「國共內戰遺緒」所造成，為何兩岸人民要承擔雙方統治政權的包袱？台灣自許為民主社會，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展現開放多元態度，是我們珍貴的資產。

台灣人口中有幾十萬人常住中國。中國是台灣最大資本輸出國，也是台灣最大的進口國。兩岸經濟社會關係無聲無息地影響台灣，但是社會之間的隔閡卻難以想像的鉅大。台灣方面的情況前面已經提過。在中國，許多新聞界與學界人士，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都抱持著一種嘲諷的態度，或是認為「台灣民主不過是民粹的翻版」。(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北京傳媒有不同於先前的報導方式。)

2005年底，一位中國知名的新聞專業學者錢鋼，到台灣觀察三合一選舉之後，曾經寫下一篇精彩的「遊記」，其中一段文字：

在臺灣的一個月，我同時觀察著現場和傳媒，看到媒體總是反映著現實的局部。那是媒體追逐的局部：最聳動、最激烈、最

有戲劇性、要被渲染被廣泛散播。然而，已然成為常態的那些事物和細節，媒體似乎沒有關注的理由。我也同時觀察著兩岸的傳媒。發現內地對臺灣選舉的報導，往往是對臺灣媒體報導的再取捨，即：凸顯民進黨的慘敗、更多展示臺灣的「亂象」。有的媒體流露出一廂情願的欣欣然之色，甚至分析這次選舉綠敗藍勝的原因是「大陸對台新思維撼動臺灣島」。經過二度取捨，媒體展示的圖像更加失真... 有人說：「誰想知道文革是什麼樣，到臺灣來看看選舉吧！」大謬。<sup>12</sup>

錢鋼的分析，精準表達了多重扭曲的資訊傳播，如何阻斷正常的社會溝通。這當中有台灣媒體市場政治化、綜藝化的因素，再加上中國媒體政治宣傳的作用。從錢鋼的話語中，我們警醒到兩岸之間自由無礙的溝通何其匱乏而迫切。

兩岸公民對話，根本的精神在於交換歷史經驗，兩個社會如何各自在帝國主義以及威權政治陰影下追尋自由與解放。通過與中國進步力量的接觸，來活化台灣對於中國的僵化想像。台灣遭受殖民外來統治的傷痕，與中國被帝國主義欺凌的經驗，兩岸社會可以在此尋得共通的歷史脈絡，而獲致共通感受。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需要敏感而細緻地處理跟台灣的交流對話，理解台灣人民對中國的防衛心理從何而來。從一方來看，一千顆飛彈是對準「分裂祖國的力量」；但對於另一方，這些飛彈是在呈現「外來殖民者對弱勢本土力量的欺凌」。

歷史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是不容片刻鬆懈的永恆磨練。「一邊

---

12 錢鋼，〈我所看到的臺灣：一個大陸人眼中的臺灣地方選舉〉（草稿）。



是魔鬼，另外一邊則是汪洋大海。」這是漢納·鄂蘭在思索「獨裁政治下的個人責任」時，提出的警語。這句話，也適用於今日處理兩岸歷史性和解的情境。民主的新生力量，不玩魔鬼的遊戲。航向汪洋大海——我們還在冬夜的旅途中。

吳介民，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曾參與創辦當代中國研究中心。1992-2004年曾經參與「里巷工作室」，與友人合作拍攝《台胞》等影片。研究興趣在民主化、社會運動、中國民工階級形成與公民權理論。